教育的异化与回归

——杨贤江教育本质思想的新诠释

秦俊巧

(河北大学 教育学院, 河北 保定 071000)

摘要:教育在生活的需要中产生,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,当它走出“婴儿期”走进“少年期”,从原始社会迈入阶级社会之后,却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而逐渐异化。时代在呼唤教育的回归,变质的教育必将退出历史舞台,在更高程度上回归本位。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杨贤江对此作了深刻的分析。

关键词:杨贤江;教育不平等;两重教育权;教育异化;教育回归

中图分类号:G40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009-010X(2008)03-0011-04

一、教育的起源及本质

教育在生活的土壤中孕育、萌芽,在时代呼唤的雨露下茁壮、繁荣,伴随着社会的需要而生长、发展,它的成长状况取决于它生长的土壤、水分和其他各种条件。如若遇到暴风雨的袭击,它会顺势而弯腰、低头,甚至扭曲。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杨贤江曾指出,教育产生于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,“是社会所需要的劳动之一领域,是给予劳动力以一种特殊的资格的;换句通俗的话,教育便是帮助人营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。”动物与教育是毫不相干的,例如,在实验室里人工孵出来的小鸟,没有见过任何鸟的飞翔,发育到一定阶段,飞起来也跟其它小鸟一样。可知小鸟飞翔,完全是本能的行为,并不需要教育。由此可见,教育是人类的一种社会现象,是人类的一项专利。“但是,这样一种起于人类实际生活需要的教育,并不是终古如斯的;它的意义和它的内容是常常变的。”“只要是现实的经济关系变了,它是必然地跟着变的。”因为教育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传递生产和生活经验的必要工具,作为“工具”必然要随着生产水平和生活经验的变化而发展。

杨贤江说,“这个转变的关头,是在社会的分成阶段。在社会未有阶级即在原始社会时代,教育是全人类的,也是统一的,等社会分成阶级,即在所谓文明时代,教育就变成阶级的,且是对立的。”既然教育

所依存的土壤出现分层,所生长的环境发生变异,那么教育自然而然地脱离本性而“变性”异化。杨贤江指出:“这个变迁的大概,可说如下:第一,在氏族制度时代之教育,是为种族之维持发展,由一代向次代传下物质的及精神的社会的遗产,完全是生物学的目的。第二,当私有财产制勃兴时代,社会分裂,从而教育于生物学的目的之外,加上当作支配工具的目的。第三,当私有制已经发达之后,教育之目的遂变为忽视第一义而重视第二义。”

原始社会是人类未开化的时期,面对苍茫的大自然,仰望高高的苍穹,远看杂荆丛生的森林,搏击凶猛的野兽,相比之下,人类的力量是那么的渺小,人的生命是那么的脆弱。但人之所以被称之为“最高等的动物”,自然有独特之处。动物只是把同类的本能无意识的“遗传”给下一代,而“当代的人,一面利用由前代所传下的精神及物质的遗产,一面更加上新的经验与发明,以传授给下一代。”这不是无意识的,而是有目的的;这不是消极适应,而是积极主动。人类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:生存。开始自觉地互相帮助,共同协作,组建集体。在生产生活中有意识地把自已获得的经验传授给下一代,这便是教育。这种与生活浑然一体的教育,人人得以享受,人人必须接受,受教育是生存和生活的需要。正如杨贤江所说,这种教育“除‘种族保存’(‘个体保存’包括在内)之

本文系“河北省教育科学研究‘十一五’规划课题——中国现代教育家杨贤江的事业与思想研究”的系列成果之一,课题编号:0614003。

目的以外,更无他种教育目的。”所以这不是个人的事情,而是社会的事情;这又不是支配的事情,而是平等的事情。”

杨贤江指出,“照唯物史观来说,社会的经济构造是现实的基础,而法制上、政治上、宗教上、艺术上以及哲学上——简言之,就是观念上的各种形态(即所谓观念形态),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;教育就是这样的上层建筑之一。”所以,教育不能脱离政治、经济、环境而独立存在发展。在原始社会,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,根本不可能存在独立于劳动之外的‘劳心者’。杨贤江说:“在原始共产社会,大家劳动,大家既(即)就劳动所需要的知能,随时随地学习,或受长者的指导;所以学问也是大家共享,且和劳动相联系的。”学习的内容‘不外两方面:一是获得生活资料的‘实用教育’;一是安慰精神的‘宗教教育’。属于前者,是渔猎、战争、利器的技能;属于后者,是风习、仪式的传授。”杨贤江科学地概括了原始社会教育的特征,他指出,“原始共产社会教育的特征,就在无阶级性、无尊重私产、拥护支配权的内容,教育与劳动不分,是每个人,无论男女,都有受教育的权利与义务的。”

二、迷失方向——教育远离本性而逐渐变异

当人类走过“婴儿期”,迈入“少年期”,为了生存,在与自然界作斗争的过程中,学习了很多的本领,积累了相当的经验教训,体格健壮了,生产力水平提高了。这使得我们的祖先也有了少许的‘积蓄’,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。正是“因为经济基础发生变动,所以巨大的上层建筑全体,也徐徐地或急速地发生变革。”社会分为两种阶级——有治者和治于人者,“劳心者”与“劳力者”。杨贤江说,“在政治上,‘劳心者’与‘劳力者’是支配与隶属的关系;在教育上,便是‘学问’与‘劳动’的关系。治者阶级一味从事‘学问’(自然,有很多是不从事‘学问’而只荒淫过日的),而绝不从事‘劳动’;被治者阶级则一味从事‘劳动’而绝不从事‘学问’;‘学问’与‘劳动’分家,教育与生活脱离,使教育异化为统治阶级的一种工具。杨贤江指出,这种社会现象是变态的,“决不是有种人生成是只配读书不做工,而有种人生成是只配做工不读书的。”生长在这种变态的环境中的教育自然的被扭曲而变质。杨贤江说,一旦社会中有了阶级,单纯的社会要求者就会不复存在,“代之而起的,乃为某一阶级的要求,自是而后,学问这样东西,终是由于这种阶级的要求以发生、以发达的。从而无论何种学

问,必然地带有多少阶级的性质、阶级的色彩。”阶级社会的教育是统治阶级的专利,是一种地位的象征,被统治阶级被拒之于教育的大门之外,不敢问津。即使有幸受一点教育,也只是愚化的教育。这时候的教育由于私有制的产生,经济基础的变动,已经与原始社会的教育发生了本质的区别,已经脱离本性而变异,具体异化过程表现在以下几方面。

1.从“教育机会平等”到“教育权跟着所有权走”。

在原始社会,人人都能受教育,全体社会成员都有受教育权。而在阶级社会,教育成为统治阶级的专用品。正如杨贤江所说“教育的分配,主要是受所有的多寡以决定;就是所有的特权连结到教学的特权;从而有产阶级成为有识阶级,无产阶级成为无识阶级。”从而由于财富的多寡,阶级的不同,贫穷的被统治者与教育是毫无缘分的。那是富有者的奢侈品,那是统治者地位的象征。如果你是统治阶级,那么你在娘胎里就已注定“此生不识教育面”的命运,即使你天生聪慧;如果你是统治阶级,你还没出生,可能已经决定好了你受教育的数量和质量,即使你是低能儿。所以杨贤江精辟地说:“教育权跟着所有权走。”

2.从“教育是为了全社会的利益”到“教育垄断——专为了支配阶级的利益”。

原始社会的教育“只有生物学的目的,就是以‘保存种族’为目的,绝无支配的意味含在里面。虽有尊重长者的教训,可不是阶级性;长老之值得尊重,是为了代表全社会的利益;尊敬长老,就无异尊敬全社会。除此别无作用。”这时候的教育是生活的必需品,而到了阶级社会,教育已成为统治阶级粉饰门面的装饰品。杨贤江指出,“在教育目的上,不复是单纯的生物学的目的,而是拥护私有财产。”这时的教育承担着两种职务,“一是当作政府的支配手段的,一是当作维持并促进经济的榨取手段的。”被统治阶级即使得到恩惠,有幸受了一点教育,但这种教育“对于被支配阶级,既不是适应他们自身的利益,也不是适应全社会的要求,主要乃是施行对支配阶级有方便的教育,以俘虏被压迫者的心意,且使之成为对支配阶级服役的工具。”从原始社会的共有制到阶级社会的私有制,教育的目的已经严重变质异化,很难再看到原来的性质。

3.从“教育与劳动密不可分”到“教育与劳动分家”。

在原始社会中,教育与劳动是水乳交融的,很难分辨出何时何地进行的是劳动,何时何地进行的又是学习,大家在学习中劳动,在劳动中接受教育。但到了阶级社会,教育与劳动却“断交”了,教育的地位“升级”了,成为陪伴统治阶级左右的消遣物、装饰品,和劳动断然分了手。就像杨贤江所说的“脑与手拆了伙,求知与做工离了婚,两者形成俨然对抗的阵势。”对于这种分家,杨贤江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,并不否认有其历史进步意义,但是他指出,如果承认这种分家为必要和当然,那就大错特错了。他严厉批评了这种“分家”的教育造成的后果。他说,“这种教育的结果,在个人方面,是读书人弄成‘手无缚鸡之力’;弄成‘四体不勤,五谷不分’;做工人弄成‘目不识丁’;弄成‘不识不知,顺帝之则’。在社会方面,是读书人高居‘四民之首’视劳动为微贱;做工人居于下流,视学问为无用。”他积极主张教育与劳动相结合。

4.从“单重教育权”到“两重教育权”

杨贤江说,“这所谓两重教育权,就是阶级社会中相并存甚至相对抗的两种教育。即教育制度之组成与教育行动之存在是相对立而不相统一的。”杨贤江指出,在原始社会存在两种教育,但不是两重教育权,更不是两种相对抗的教育权。那个时期,教育制度之组成与教育行动之存在是一致的,两者统一于“单重教育权”下,本质都是为全社会的生活需要服务,而不是专为某种特殊阶级所利用。而在阶级社会,这两种教育的关系却变了质、分了家,且对抗起来。“一种教育制度专供支配阶级的利用,被支配阶级是被摈在这种教育制度之外的,所靠者只有不成为制度的一种实质的行动。”中世纪的徒弟制度,看似一种有组织的制度,其实质却仍属于行动,不过这时期的教育制度与行动井水不犯河水,平行前进,二者没有交叉点,所以可以相互独立,而不对抗,矛盾。“但自近代的阶级制度——资本家与无产者——发达以来,即自近代的革命——资产阶级的革命以来,阶级不单是自然的对立关系,而〔且〕为意识的对立关系;这一关系的改变,同时就发生了教化上的意识的对立关系。”这二者不再是“并行不悖”,而是“水火不容”了。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相互排斥,都以打倒对方为目的。杨贤江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,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,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实质,掀开了资产阶级的面纱,为我们认识资本主义教育的本质扫清了障碍。

5.从“男女教育平等”到“性别歧视——男女教育的不平等”。

杨贤江指出,在原始共产时代男女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。“虽然在野蛮时代,女权特别优越;未开化时代,女子地位仍然较高;但男子方面,并不因此有在教育上的差别待遇;因为氏族社会实是平等友爱之社会,并无阶级分裂的。”但是到了阶级社会,由于经济基础的变革,使得女子成为男子的“附属品”,男子掌握着女子的生杀大权,决定着女子的命运。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作为统治阶级愚化政策的一部分,已深入到人们的骨髓,根深蒂固,成为女子身心的牢笼,把女子紧紧锁在绣楼上,大门不出,二门不迈,简直与外界隔绝,更是与教育绝缘。杨贤江指出,“‘重男轻女’这种‘社会道德’之所以产生,不是偶然的。凡是社会隶属与压制,皆由被压制者对压制者之经济的隶属而起。”所以“不独女子,即一般劳苦群众,在少数人握有经济支配权以前,也是不能脱离隶属的地位的。”杨贤江目光犀利,一眼就看穿了统治阶级的“花招”,对“重男轻女”这一社会现象的本质作了深刻分析,透彻的说明,并以唯物史观作为理论基础,指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。

以上五种演变过程,勾画了教育逐渐脱离本性而变异的路线,隐含着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,呈现出教育异化的大致轮廓。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由于经济基础的变化,上层建筑发生了很大的变革,教育作为上层建筑之一,已经由为“保存种族”的生物学目的,转化为支配者的统治工具;已经由教育机会平等转化为“教育权跟着所有权走”;已经由教育与劳动的密不可分到断然分家;已经出现了两重教育权的对立和性别歧视。正如杨贤江所说,“这些现象,在原始共产社会,即无产阶级的社会中,是不能有的。所以这都是教育的变质。”

三、走在回家的路上——教育挣脱“变态”而逐渐回归

在阶级社会中,教育这棵大树已经东歪西斜,扭曲变形。她疙疙瘩瘩的躯干里长满了“蛀虫”,这些“蛀虫”在侵蚀着她,吞噬着她。要让这棵千疮百孔的树挺拔茁壮,充满生机,恢复原生态,是何等的困难啊!杨贤江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,以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论基础,创造性地指出了“治疗这棵树”的方法。他指出,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,要解决教育——上层建筑之一的问题,必须从经济入手。在经济上未能独立以前,是无法得以脱离

支配的。而私有制的存在是阶级对立的根源所在,必须消灭私有制才能使教育回归本性,才能消除阶级,才能教育平等,而社会主义社会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实现的;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,势须经过一个过渡时期。

杨贤江以前苏联教育为例,指出这时期的教育已经远离了“变态”的阶级教育,向教育的正常的轨道靠拢、贴近,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回归。虽然前苏联教育也是阶级的教育,不过,它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教育有着本质的区别。杨贤江指出,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教育是为了少数资本家的利益,而苏联的教育,却是为了百分之九十五的工农大众的利益,是民主主义的。虽然“苏联现在的教育还不是个百分之百的充分和推广。”但已经在努力向教育的本性之一领域——人人都能受教育靠近。何况“俄国的阶级教育实在已尽接近全体人类的能事了。”另外,在前苏联,教育主张教育与劳动结合、男女同学、对八岁至十七岁的儿童实施平等而且免费的教育等现象,表明了前苏联的教育在努力挣脱阶级教育的“桎梏”,“游向”教育的本性,印下教育在回归途中努力跋涉的痕迹。

杨贤江还以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史观为理论依据,对未来社会的教育作了科学的预测。首先,未来社会经济完全平等,每个人都将接受一种完全的教育。“对一切儿童施以免费的公共教育。”其次,教育与劳动相结合。“每个人或者差不多每个人都必须参加生产过程”,肉体劳动将平均分配,“一切教育制度都将变成劳动制度。”教育成为“社会所需要的劳动之一领域。”再者,“未来社会主义的劳动训练,将启发每个儿童的好性质,且将使每事都受制于儿童自身及全体的利益以行。”这是对“种族保存”更高层次的复位。总之,未来社会是生产力高度发达、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。国家已自动消失,阶级已悄然消亡。在这样的社会里,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的发展,每个人的潜能都能得到充分的开发,教育不再是某一阶级的奢侈品,而是每个人的必需品。未来社会的教育,既回归了本位,又高于本位,是“更高层次的复位”。

四、一路走来——教育的演变历程

纵观教育发生、发展的历史,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教育一路走来经历的坎坎坷坷,留下的串串脚印和深深足迹。人类社会从一开始产生,她就背起行囊踏上了征程,就像杨贤江所说的“自有人生,便有教

育”。“教育的发生,就植根于当时当地的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;它是帮助人营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。”在原始社会,这一人类的初期阶段,教育保持着它的本色,“种族保存”是它唯一的目的,教育与生产生活融合在一起,教育在随时随地进行着,没有不公平,也没有阶级性。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,私有财产的发生、发达,人类的生活遂发生根本的异化,教育被统治阶级俘虏,成为统治阶级手中的“棍棒”,束缚人的“囚笼”,禁锢思想的“紧箍咒”。正如杨贤江所说,“国家是建立在原始共产社会之废墟上的回旋舞台。……在任何舞台面上,台柱子终是‘所有多者’,‘跑龙套的’终是‘所有少者’及‘无所有者’。而所谓‘教育’这条鞭,终被握在台柱子手里,以之驱策指挥‘跑龙套的’用的。”教育从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脱离出来,一跃成为统治阶级身份、地位的象征,成为独立的社会事业,呈现出五种新的特征。“第一,教育的地位——‘教育与劳动分家’;第二,受教育的权利——‘教育权跟着所有权走’;第三,教育的职能——‘专为了支配阶级的利益’;第四,教育的双轨制——‘两重教育权的对立’;第五,教育的歧视性——‘男女教育的不平等’。”这种异化的教育是与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私有制相联系、相适应的,杨贤江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论基础,从教育与经济、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出发,揭示了这一现象的实质,并对未来社会做了科学的预测。随着社会的发展,私有制的消亡,教育必然会找回她的童真,并增添几分成熟,经过螺旋式上升的模式,在更高程度上归位。“杨贤江引用美国人摩尔根的话,把这种回归称为‘在一个更高形态的复活’。革命导师列宁对此也有精湛的论述,称此为‘更高形态的复归’。”

教育从生活的需要中走出,从原始社会中走过,经过阶级社会的长途跋涉,终于要回归了……回归的不仅仅是走出的,还有一路的收获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任钟印.杨贤江全集(第三、六卷)[M].郑州:河南教育出版社,1995.
- [2]吴洪成,陈淑霞,等.不朽的革命人生 辉煌的教育成就——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杨贤江的理论与实践[M].北京:光明日报出版社,2005.
- [3]瞿葆奎.教育与教育学[M].北京:人民教育出版社,1993.

【责任编辑 韩四清】